

开平煤矿近代化进程简论

孙海泉

开平煤矿作为中国近代企业和近代化煤矿的代表,从其兴办的洋务运动时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开平煤矿的风雨历程,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其主持人呕心沥血的业绩,为我们公正地评价洋务派提供有力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近代企业的历史作用。笔者以此为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试图对开平煤矿的近代化进程作一简单的论述,求教于史学界同行们。

一、关于开平煤矿开办前的构思

李鸿章曾于1875年开办直隶磁州煤矿,终因运输困难,矿藏不旺而失败。但李鸿章并未气馁,决定开办开平煤矿。1877年,李鸿章饬令唐廷枢责任办理开平煤矿。唐氏接办此矿后,焦劳擘划,惨淡经理,不遗余力,至其逝世。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使矿局规模完备,成效显著,奠定了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河北省滦县开平镇西南十八里之唐山,素产煤炭。在明代,土人就开始用土法开采,在唐山之麓,有数十处的窑坑。近代以后,土法开采已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它无法使开平煤矿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于是李鸿章、唐廷枢凭借着洋务运动的东风开办了开平煤矿。开办时的构思具体说有如下几点:

第一、煤铁兼兴。如果说开平煤的开挖由来已久的话,开平铁的开挖却是不曾有过的,只是在唐廷枢实地考察后才发现开平有丰富的铁矿。唐廷枢于1876年偕英国矿师马立师一同去开平勘察,携回了煤铁矿样,分寄北京同文馆及英国化学师巴施赖礼、戴尔等化验。结果出来后,唐廷枢于11月写成《开平煤铁矿化验成色简报》禀呈李鸿章。^①

在唐廷枢看来,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②,他在《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办铁路禀》中有“论煤铁乃富强根基”一节,论述了煤铁兼兴的重要性。他以英国为例说明之,英国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能充分利用煤铁资源,每人每年可得利银10余两,“无怪其富甲他国”了,而“我国地亩人民十倍于英,不但无此进款,反每年支出六七百万两,以购他人之煤铁,宁无彼

盈我绌耶?”^③这说明唐廷枢不仅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且看到了煤铁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此禀呈报李鸿章后,煤铁兼兴的思想正与李氏“非煤不济,非铁不成”的思想相一致,颇得赞赏。同时开平若能煤铁兼兴亦可弥补他在磁州兴办煤矿不成的损失,求得心理的平衡。

唐廷枢得到李鸿章的赞扬后,在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中明确地申明:“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熔化生熟铁等事。余外生意概不搀越,以专经营。”由于经费所限,先“建生铁炉两座,熟铁炉二三十个,并锤铁,拉铁器备全”。一旦经营得法,盈利丰厚,再招集商股,扩充经营。^④对于章程,李鸿章批示曰:“就近熔化生熟铁,不得搀越余外生意,自是正办。”^⑤予以支持。从以上材料看,李、唐二人对于开办开平煤铁信心十足。特别是唐廷枢,他曾考察过英国的煤铁情况,他说“其市面发售铁板、铁条,高者每百斤工价二两三四钱,中者一两七八钱,次者一两三四钱”。而“我国夫力最廉,(开平)石炭煤炭又就地均有,大约熟铁每百斤成本银一两左右,……若所炼之铁,能照该化学师评论,可与英国中等钢铁或次等钢铁相行。则其利更厚矣”^⑥。

不难发现,倘若开平煤矿果能按此蓝图发展,则定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不仅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能源,而且也提供了大宗的钢铁,成为新兴军事工业的后盾。轮船的航运不患无煤,枪炮的制造不愁无铁。从这一意义上说,开平煤铁的兼兴,不仅是开了利源,而且适应了军国之需。难怪李鸿章说:开采开平煤铁可以“开利源而应军国之需”。^⑦

第二、振兴开平实业,有利风气转化。李鸿章作为近代一位有头脑、有知识的人物,对风气未开的严重性是有认识的,“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用气未开,精华闷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大宗”^⑧。这话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矿务不兴,非矿藏不如西洋诸国,实因风气未开之故。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政府的治国政策是“重农抑商”,凡重农业者通过科举制即可登仕途,开矿重商者受轻视,加上封建迷信的

的影响,欲开矿设厂者止步,欲投资企业者裹足,形成了一种以开矿设厂为耻的社会恶习。直到洋务运动前,开矿设厂皆为人们所避讳的问题,然而世界潮流又是如此的浩浩荡荡,开矿求利,设厂自强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不可抗拒。李鸿章、唐廷枢等近代的弄潮儿,怎能无视于世界潮流呢?他们要求发展实业,就必须对封建的生产方式有所改变,就这一意义来说,他们确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在如何开办开平矿上,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一致的,即用西法开采,所以李鸿章才派唐氏负责开平矿务。在李鸿章看来,唐廷枢是一位“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洋稽博考,胸有成竹”之人^⑧。对于以后唐廷枢提出的开办建议虽不说是言听计从,也做到了竭力支持。李鸿章希望开平矿“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矿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起”。如此,风气之开“于大局关系非浅”^⑨。事实上,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的主持开办下,虽然铁矿的开采未能实现,但它从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李鸿章的目标,即开风气之先。郑观应赞曰:“中国风气未开,积重难返,创办一事非大力者不能成。年来章请开矿者不乏人,独数开平办有成效。”^⑩这话虽是赞扬开平煤矿,但从中我们能看到开平矿对转化风气所起的作用。

第三、“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的谨慎思想。土法开采的落后性已为众人所知,只有用西法开采方能不负众望。但西法开采对于中国的矿业来说还是陌生的东西。故唐廷枢认为“宁可迟迟开办,不可草草误事”^⑪。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取其所长,去其所短”^⑫的效果。在开平煤矿开办之时,唐廷枢禀陈李鸿章说:“工程浩大”,必须先行勘察。对采得之矿务标本进行化验,如“果有把握”,则“禀请核示开办”^⑬。唐廷枢也确实这样做了。化验的结果表明,“其铁既无磷酸,其煤又无硫磺,却是相宜之事”^⑭。在这种情况下,唐氏才上禀请开开平煤铁矿。

在禀文批准后,唐氏并未草率行事。首先详立了章程,对企业的资本性质、集资情况、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都一一作了考虑。其次,对于引进的机器款式、型号必须讲求。他说:“铁炉、铁锅、拉铁机器等件,款式最多,大小不齐,应用何款何式,马力多少,须申明地势石质煤力等件,方不致徒劳费力,虚费煤工。”^⑮当这些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决定订货和购买与否,因为冶铁机器费资甚巨,稍有不慎则浪费很大。唐廷枢不仅自行先作量力而行之计,还须与洋矿师“面商”,可小则小,可省绝不糜,为企业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总而言之,唐廷枢为了开平矿务局日后的“远大宏猷”,计划周密,考虑精详,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开平煤矿的开采基于上述原因,它的出现应乎时代的召唤,顺乎时代之潮流。从它创办之日起就具备了近代化的色彩,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政治上的强国御侮,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近代化气息对散发着腐味的传统落后意识的冲击,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

二、唐廷枢与开平煤矿的近代化

(一)开平矿务局之设立

1875年李鸿章奉旨创办开平煤矿后,即任命唐廷枢负责矿务之事。唐廷枢在对土法开采作了详细的研究后,指出土法开采已不再适用。唐廷枢不仅道出了土法开采的不利之处,还研究了西洋的采矿方法,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其时西人探矿采煤之法,确实远超中国。其寻矿方法,先察地势,而觅煤穴,然后钻探地下,验其虚实。如有佳煤,即开二井,深至底层,复另开横道,使二井相通,得以生气养人点灯。灯用玻璃密罩,撑持均用大木;并于井底开一小路,旁挖小沟,使水会聚,由大井置入抽水机器,有水即抽。因此,既可通风,又无水患。至于采煤之法,先挖深煤底及其两旁,用铁锤敲之,则煤块自落。然后用手车运至大井底,以机器提出,无怪西人每日每人可采煤四吨半,而开平土人只有四五百斤而已。比较的结果使唐廷枢决定用西法开采开平煤矿。

根据开平矿区所提供的煤炭成色和铁矿石成色的分析,使唐廷枢对办好开平矿寄予了莫大希望。“若将土工之廉,引之以西法,煤块必多,煤本必轻无疑”^⑯。李鸿章在阅毕唐氏的呈报后,批示照办,并同时委派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等会同督办,以襄厥成。唐廷枢深知此时为中国以西法开矿千载之良机,又遇上司李鸿章如此鼎力相助,乃与丁、黎二人迅速拟就了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禀呈李鸿章。章程共十二条,要旨如下:(1)本局定名开平矿务局,专采开平一带煤铁各矿;(2)本矿系招商集股,官督商办;(3)拟集资80万两,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纹银一百两,任人认购,若日后需再招新股,以20万两为限,合100万两;(4)每年余利,先提官利一分,后提办事人员花红二成,其余八成,按股均分;(5)本局所出煤铁,照市价先听机器局及招商局取用,如有所剩,再行出售。李鸿章阅毕章程,逐条批示照办。1878年9月21日,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局,10月开工凿井了。

从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我们可以看到:(1)开平矿务局起初是决定煤铁兼营;(2)矿务局享有优惠待遇。款六规定“提官利一分”,这比过去的二八收课要低;(3)矿务局为官督商办。清廷有管束大权,但资本主

要有商人集股。

关于开平矿务局的资本性质,有的论者认为“开平的股本,不论官款商款,可说都是官僚资本”。笔者认为开平矿务局的资本性质应为“民族资本”。原因如下:

第一、章程款二“议招徕商股,众擎易举”之语说明企业是希望商股投资的。起初企业准备集资80万两,分作八千股,任人认购。“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这种一股不嫌少,千股不为多的集资方法自然是针对分散于民间的游资加以集中而言。同时章程对投资认股作了详细的规定。每股分三期交清,注册时交10两为第一期,第二期交40两,第三期交50两,等交清百两后再换发股票。李鸿章对之批示也云“凡入股者,详开姓名籍贯,即交附近招商局代收”^[1]。这说明集资是严肃的,也是面向民间资本的,否则没必要作如此烦琐的规定。

第二、《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款五白纸黑字写着:“此局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仍照买卖常规,俾易遵守。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方能有裨于事”^[2]。这里规定的是企业的经营方式。厂局生产的产品归商人销售,矿局的负责人员(司事)要从股东中选拔,由他们共同监督,管理工厂。款八更明确规定:“查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其能当何职,应受薪水若干,由总局酌定。若其人不称职,或不守分,任由总理辞退,仍请原人另派,以昭平允而免误公”^[3]。人事权的初步民主化,使企业明显地带有自由资本主义的性质。

第三、开平矿务局的创办是否借用官本殊难断定。矿务局开办之初是由唐廷枢招集商股而成,只是由于当时的风气未开,更加矿务局为了挑河筑路,所费颇巨,先是由唐廷枢垫款10余万两开办,后终因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热望政府能给以官本扶持,唐氏在京报李鸿章时苦苦恳求:“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两。现已多用十万两多零。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实为心力不逮。可否吁恳爵中堂,终始成全。于机器、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暂资工需急用。于本年职局所交之烟煤、焦炭及船捐三项抵销。”^[4]此五万官款是否李鸿章允准拨用,似无证据,殊难定论。退一步说,就是李鸿章拨了这五万官款,也不能把开平矿务局的资本说成为官僚资本。五万官款毕竟在百万资本中是微小的数字,成不了气候。倘若开平资本全为官僚资本,则近百万的商人资本岂不也成了官僚资本吗?何况,借用官本必须以矿局所产煤相抵销,或一旦盈利立即奉还。可见,这里的五万两银子与其说是官款,不如说成借款为宜。

第四、唐廷枢等人虽有一官半职,但他们在企业中

的红利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只准提二成,不得多提,其余的八成仍按股均分。在这八成的分利中,他们所享受的待遇与商人无二。事实也是如此。在1880年矿务局经费拮据之时,唐廷枢曾垫款十余万两银子,说明他是腰缠万贯之人,但它后期却如此凄凉,可见他不但没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而且把自己的资产也全部投资办企业了。在他的经营下,企业按章办事,它不但不是任何封建官僚或其集团的私产,而是商人共同投资兴办,共同取利的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生产目的又有抵御外侮的成分。所以,我们应把开平煤矿归诸民族资本的行列。

第五、张翼接办矿局后的中国资本,亦应属民族资本的性质。虽然张翼是由官方委派主持开平矿局的,并有候补知府的身份,同时又投资三十万两,是最大的股东。按章程规定,他也理所当然的是股东中的主要人物,更是矿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可能把矿务局变成自己的私产,所以张翼说:“开办十余年,并无官款,均系商股商办,……凡在矿务局管理矿务者,自本督办以下,多系有股之人”^[5]。这里不难理解,因开平矿务局创办初的招商章程中有矿局司事要从股东中选充的规定,所以管理矿务者,自应是有股之人。这里的有股之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商人、买办和有一官半职之人。他们投资开平矿务局并在其中管理企业是章程明文规定的,他们并非是张翼集团之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而定其投资的性质。

(二)开平煤矿的近代化

唐廷枢设局后,根据开办章程需招股80万两。于是唐廷枢四出招募股份,但由于当时的风气未开,裹足不前,持观望态度者颇多,至1878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只募得股本20万两,至1880年,实募30万两。但开平煤矿的投资此时已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唐氏认为:“天下各矿盛衰,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次审出数之多寡,三审工料是否利便,四计转运是否艰辛。有一不全,均费筹画。”^[6]于是矿局在引进新的技术,开设新的矿井、修造厂房以及更新设备的同时,准备疏通河道,实际耗费已逾40万两,为了不使矿局流产,唐廷枢垫资10余万两,另一方面又呈报李鸿章,请求予以接济。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唐廷枢之所以不泄气,是因为他凭借着自己的经验相信,一旦矿井出煤,有利可盈之时,这一窘困之局面定会烟消云散。1880年过去了,翌年给开平煤矿带来了生机,开始产煤了,“每日出至五六百吨之多”^[7]。于是开平煤矿的声誉鹊起,招股亦容易了。1881年11月8日的《捷报》称,“矿局在上海已集股一百万两”,用于采煤、运煤等项设备。唐胥铁路此时也正式有机车曳引。到1882年,添购英国机车车辆,

用费超过了150万两。但矿务局之煤业已外销,1882年产煤38383吨,运往天津销售的8185吨,获利36833两。虽然盈利不多,但它犹如启明星,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到来。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开平煤矿的股票在市场上的价格亦有提高,面值百两的股票,涨至154两,到1883年春,股票持有者已拒绝210两之售价。从开平股票的走俏亦可见开平矿此时的光明前途了。

开平煤矿的发展趋势使股东们敢大胆投资经营了。到1891年据薛福成统计“历年共费银二百三十万”^②。本重利优,开平煤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产量逐年上升,现列一简表来说明开平煤矿的发展。

开平煤矿的产量和外销量(1882—1889年)^③

年别	产量(吨)	天津输出量(吨)	占产量的百分比(%)
1882	38,383	8,185	21.3
1883	75,317	8,503	11.3
1884	126,471	13,731	10.9
1885	187,039	17,485	9.3
1886	187,314	31,100	18.2
1887	224,705	16,492	20.7
1888	241,136	38,042	15.8
1889	247,867	51,959	21.0

从表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开平煤矿前几年的产量几乎是在成倍地增长,至1887年产量超过22万吨,1888年则达24万吨。输出量与产量成正比,也在逐年增加。这表明,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由于铁路的修建已得到了解决。输出量的增大使企业盈利日多,从1882年获利36833两,至1887年的185978两,增至1892年的237002两,于是股东从1888年开始可以分享红利,同年7月,开平矿务局在天津办事处召开了股东大会,通过帐目,分配六厘之年利^④。以后,年利越来越高,到1893年,年利达一分零五毫^⑤。

在开平矿务局盈利的路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李鸿章的功劳。1881年在煤矿刚刚出煤之际,他即奏《请减出口煤税片》。他指出,土煤每吨税收达一两有奇,而洋煤每吨税银5分。二者盈绌悬殊至20倍之多,土煤何能敌洋煤耶?其势若不改,“(开平)煤必不能畅销,而关税亦鲜有实获”。“与其税重而少所收,不若减税而多所纳”。原定的税收政策是“洋货税则过轻,土货税则较重,以致华商疲累,难与洋商颉颃?”所以李鸿章奏请以后引台湾煤之成例,开平煤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⑥。李鸿章所奏获允后,开平煤矿无形每年将增加20万两以上的收入。

如果说开平矿务局之初因经费困难使采铁计划受阻的话,那么到此时,唐廷枢的采铁计划应付诸行动

了。何况李鸿章对此也赞成,批示照办,并且李氏因考虑到唐廷枢要兼营上海轮船招商局以及会办郑藻如政务繁忙,遂于1881年12月17日复派“老成干练,通晓西语,亦擅矿务”的吴炽昌为会办,着手采铁。然而李鸿章上奏朝廷请开铁矿后,不料礼部右侍郎祁世长以该地为京畿之地,开铁有碍祖宗陵墓为由,坚决反对采铁,以至矿务局的采铁计划一再拖延,最后是不了了之。可见风水之说严重地阻挠着近代企业的发展。

正在开平矿务局蒸蒸日上之际,唐廷枢于1892年不幸逝世。他的死给开平煤矿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他经营十有余年的开平煤矿至此已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我们不妨从下面几点来探寻其近代化道路的轨迹。

1. 厂矿技术设备的近代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科技工艺的引进,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特别是那些早年曾在洋行里混过事的买办阶层。唐廷枢作为他们的代表,在实地勘察了开平土法开采后,建议用西法开采开平煤矿。

首先,他主张聘请一些西洋的矿学家,李鸿章也颇为赞成:“其煤铁厂规条,须俟矿师到后,察看情形,审时度势,……以期经久无弊。”^⑦于是在1876年11月,唐廷枢就曾偕同英矿师马立师一起赴开平实地考察。矿务局成立后,唐廷枢又聘请了英国杰出的矿师柏爱特、墨莱斯高尔及金达等人,他们为开平矿务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金达夫人也曾于1881年6月9日主持过中国第一辆机动火车——中国火箭号(Rocket of China)的试车典礼。

其次,在生产工具上,唐廷枢引进了抽水机、提煤机。抽水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井的正常生产,摆脱了土法开采时无法摆脱地下水困扰的局面,抽水机“有水即提”,使得矿下“路既干,灯既明”,过去土法开采时的“锄愈深,水愈涌,非止路远,而且泥泞”的局面已大为改善,便于开采了。提煤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下所产之煤的提出。土法开采是人力绞动轱辘,用竹篮提煤,而现在用机械的力量代替人力,无疑是一大进步。土法开采时,开平矿的工人由于种种不利条件,每人每日采煤四五百斤而已,而使用提煤机和其它开采工具后,每人每日可出煤四吨多,悬殊之大,令人惊讶。抽水机和提煤机的运用是用机械力代替人力,这是生产力进步的标志,也是开平煤矿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此外,唐廷枢为开平煤矿的近代化,在采煤工具上还运用了铁锤敲煤,使采出之煤大都为块煤,提高了煤的售价。他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还仿照西式开井之法,在井底挖小井,使井底相通,保证了井底的通风,可以降低瓦斯的浓度。同时,唐廷枢在井底还采用了安全

灯皆用玻璃密罩,不至火星触及瓦斯,引起轰然之变。种种技术上的革新,使开平煤矿走出了土法开采的窠臼,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了。

2. 运输的近代化。铁路是交通运输的最佳工具,亦是发展经济的大动脉,西方工业革命的显著成就之一便是火车的行驶。但在中国,火车的行驶就相当困难,那根深蒂固的风水迷信之说时刻在困扰着近代铁路的诞生。1880年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建清江浦至北京的铁路,反对者们便竭力抵御之,御史余联沅说修铁路有“五大害”:一害舟车、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风俗、五害财用;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说修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九,有害者九”^[9],内容尤属荒唐;内閣大学士徐致祥也给铁路列有“八害”,说“祸国殃民,莫大于是”;至于象内閣大学士文治“睹电竿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更是丑态百出。在顽固派的围攻和抵触下,清江浦至北京的铁路敷修计划流产了。但滚滚长江水,毕竟东流去。铁路的修筑已势在必行,顽固派们想挡住历史的车轮宛如螳臂当车。

1881年,开平煤矿产煤后,唐廷枢就敏锐地感觉到敷修铁路对于开平煤矿发展的积极作用,“若有铁路运煤,便多开一井”^[9],于是唐廷枢奏请李鸿章,建议修筑铁路。关于敷设铁路之利,唐廷枢曾算过细帐,若没铁路运输,开平煤运至上海则成本费用合计每吨六两多,而用铁路运输只需成本费用合计四两,两者成本费用相差银二两。厚利所在,李鸿章亦为之心动,于是决定修建铁路。由金达一手主持,于1881年2月兴工修筑胥各庄到唐山的铁路15里,于6月竣工,15里的唐胥铁路与专运煤的从芦台镇东起到胥各庄止的煤河相接,便于煤炭的外运。起初由于顽固派的反对,铁路只能用骡马曳引车辆,但矿局的发展容不得风水横行,于1881年6月9日,即乔治·斯蒂芬逊百岁生日,中国的自制机车终于冲破了风水之说,开始运行在唐胥铁路上了。机车的轰鸣犹如受屈巨人的怒吼,声声汽笛无疑是向风水之说的挑战。至此,中国铁路史上著名的唐胥铁路在艰难中诞生了。它是中国自造铁路的滥觞。

没有开平矿务的发展,绝不会有唐胥铁路在那时的敷设。唐胥铁路的修成其功绩不仅仅是中国铁路史上的里程碑,重要的在于它宣告了风水之说的破产,中国风气为之大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唐胥铁路的修建而仍旧拘泥于风水之说,中国的铁路将于何时出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将依靠什么?

铁路的修建给开平煤矿带来了广阔的前景。随着产量的增加,外销量也日渐增加,前表已有说明。以1894年的外销量140796吨计,由于铁路的兴建可节省运费近30万两,对于一个矿一年来的收入来说,是

笔不小的数目。铁路之利使人注目。矿局的发展对铁路又提出了新要求,1886年矿局决定将唐胥铁路扩至芦台,并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由伍廷芳为总理,集资25万元,于同年11月动工,翌年5月竣工。1888年8月,铁路又延至天津。至此,开平煤可由铁路运送至天津煤市销售,增强了和日本煤争夺天津煤市的能力。

1889年后,开平煤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自己购买轮船,从天津把开平煤分运往旅顺、威海卫、烟台、上海、海口、广东等地销售。到1899年,开平矿务局已拥有6艘轮船,总吨位在8300吨左右,专事运煤外销。开始了争夺其他通商口岸煤市的活动,近代化的交通运输设备,可以说是开平煤矿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为开平煤矿的近代化起了铺垫作用。

3. 经营方式的近代化。土法开采的煤矿虽多属民办,但其规模甚小,资本菲薄,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里无法诞生。只有到洋务运动以后,“制器之器”的引进,大机器生产才得以发展,官办的军事工业虽然未能使中国走上经济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但它作为历史的衔接点,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官督商办企业就明显地带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开平矿务局而言,在其招商章程中就明文规定,企业是官督商办的性质,集资是面向民间的,企业的管理也有股东参与,利润按股分成,这一切完全是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股份有限公司而经营的,它也成为开平煤矿走上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唐廷枢时代,开平煤矿经过了从土法到西法开采的过渡,使开平煤矿获得了新生,不仅使日本人那“以机器开采,每日约可采掘三百吨”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在1881年即有五六百吨,1884年日产量超过了900吨^[9],到1894年,日产煤量达1000至1500吨^[9]。以后开平煤矿的发展更为捷速。

三、开平煤矿的变化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的主办下,十有余年,颇有起色,不幸的是在1892年唐氏本人却逝世了。其对开平煤矿的经营可谓不遗余力,但煤矿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时常受到资本短缺的困扰。在开办之初,实募得30万两股本。1881年,唐氏赖其兄唐廷植的帮助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募得百万股银,实属不易之举。可见矿局资金不足,势难免于将来厄运。

唐廷枢死后,当时江苏候補道张翼继任开平矿务局的督办。张翼,字燕谋,河北人。“出身于醇亲王府侍役,为奕譞夫妇所嬖爱。其继室又与慈禧太后有瓜葛之亲。故权势烜赫。后投效北洋,为李鸿章所赏识”^[10]。难怪袁世凯说张翼是“起家寒微”了。张翼接办开平矿后,

大事经营,先后增开了西山新井和唐山第三号井,矿局产量日增。1892年年产量为252538吨,到1896年增为488540吨,1900年则达778240吨^①。产量的增加,使张翼欲大肆恢宏企业,矿局先后在各大城市设立自己的办事处。当时直隶总督王文韶害怕外人攫取秦皇岛,与张翼商量决定自行修港,张翼同意。于1897年开始购买周围的土地,并决定从开平到天津铁路线上的汤河车站修一条5英里长的铁路至秦皇岛,以便使秦皇岛成为开平煤炭外运的重要港口。此事呈报总衙,总衙上奏允准,并饬令总税务司赫德妥为办理,前任天津海关税务局德瑞琳也前往秦皇岛,为会开办埠事宜之税务司。外国人的热心,使张翼受宠若惊,决心积极经营,承担了修筑码头的工程。

庞大的计划,惊人的耗资使开平矿务局无法承受。此时的矿局虽然规模较前恢宏,但资本所增无几。正在一筹莫展之时,1898年英商墨林经德瑞琳介绍与张翼相识,墨林表示可借款20万镑(140万两)以助开埠之事。据《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查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于是张翼让墨林派一矿师来华任总工程师,同时为其代理人 and 外国股东利益之监护人,于是美人胡佛便取中文名胡华于1899年3月携眷来华,居住天津。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势及直隶全省。八国联军随之侵华镇压,张翼抱着可俾矿局免遭战火同时又可复增洋股的侥幸心理,决定把矿局改为中外合办企业。“将唐山开平矿局,作为中外矿务公司”^②,授全权于德瑞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处理公司财产。德瑞琳获得此权后便与胡华一步步地攫取了开平煤矿的矿权达三十余年之久(1901—1934年)。

开平煤矿从张翼接办后,中国资本所获利润就开始减少了,中国资本的比重也减轻了。唐廷枢时代是量资行事,而张翼则大肆扩充,每每负债。到1900年,开平煤矿实际费用达419万两,而所招股本只有150万两,负债达269万两。其中虽有中国资本,但绝大部分是外国资本。到1898年夏,外资在开平矿权中所占比例几达50%,矿局大权操诸洋人之手。英商又于1901年攫取了整个开平矿权,于是他们大肆掠夺中国资源。

1901年6月24日开平矿务局电云:通过设备的改进,“其所出煤斤,前两日出五百吨,今则每日增出至一千吨矣”,“每年获利一百万元”^③。据1906年9月14日《捷报》称:“目前每日产煤3000吨”,并且开平矿务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那支商轮队伍和雄厚的实力,使开平煤“销路甚佳”。对此,英商仍不满足,“据经理告诉我,工厂设备还要加以扩充,以期在1908年每日产煤量提高到5000吨”^④。日产量、年产量的提高,使矿局获利增多,按1901年时每吨煤净利3元计,1905年、1908年和1911年矿局的获利分别是250万元、360万元和430万元之谱。但由于矿局的资本中外资已占一半,中国资本所获矿局之利至多为一半,与矿局的发展相比,中国资本的势力不能不说是衰败。更重要的是,矿局主权的丧失,使开平矿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有效手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他们只是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攫取中国的厚利。

回顾开平煤矿的兴衰史,我们不应忘记李鸿章、唐廷枢等人的功劳。尽管他们所代表的是清政府,但他们凭藉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和一点中国人的骨气,在外国侵略加深时,力主开办开平煤矿,作为抵御侵略,保证国利的手段。事实上,开平煤矿在它的前半期确实做到了此。1881年开平出煤,1882年即开始向天津运销。当时日本煤在天津的标价是:广岛煤矿的块煤每吨售天津纹银七至八两,三池煤矿的块煤则为七两,而开平煤矿的块煤以每吨四至五两的价格在市场上招揽生意,这便使日本煤在竞争中明显地处于劣势,日本煤在天津的销售量出现了萎缩现象。日后随着开平煤产量的增加,运输条件的改善,成本的降低,在天津市场上的比例开始了明显的转变。日本煤迅速地减少,到1888年,一度减为120吨,到九十年代后,天津煤市就“不复有洋煤进口了”^⑤。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时代的开办无疑是利国利民的。时人论曰:“中国有利之矿,仅开平煤矿耳。”^⑥此话虽有偏谬之处,但不无道理。它为日后开滦煤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开滦煤矿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其功劳尤为可嘉。

注:

①《洋务运动》卷七,第125页。

②《洋务运动》卷七,第117页。

③《洋务运动》卷七,第120页。

④《洋务运动》卷七,第130页。

⑤《洋务运动》卷七,第133页。

(下转第86页)

四、要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李大钊重视农民教育的观点,主要有四方面内容。一是农民教育的重要性。他曾认为,地主对农民“精神上修养”的掠夺,比对他们的财富掠夺“更是可怕、更是可恶”。二是要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由于帝国主义压迫、封建主义统治,农村文化水准比较低,农民中存在着大量的封建迷信、村落主义等落后意识。克服这些意识要靠教育,要向他们讲解革命的原因,指明道路和方向,“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这类歌声,应常常吹入他们的耳鼓”。^⑩三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四是农民教育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他建议,“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课

本可用“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

李大钊教育农民的见解,今天看起来仍感其撼人的力量犹在。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变革农村、解决农民问题的深层要求。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李大钊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把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归因于“知识阶级特别是知识青年不肯到农村去做教育启蒙工作”,这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不足。

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直接实践农运工作的机会不多,加上1927年就英勇就义,所以,他的农民观没有得到展开并进一步系统化。这只能是历史的遗憾。他已阐明的重视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和教育农民等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在中国农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

①②③④⑥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李大钊选集》,第3页、第146页、第146页、第148页、第535页、第533—534页、第525页、第534页、第565页、第568页、第569页、第567页。

⑤《新青年》,第5卷,第5号。

⑦《前锋》,第二期,第5页。

⑧⑨《孙中山全集》,第十卷,第555页、第556页。

②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观点,参《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255页。

⑫⑬《六大以前》,第699页、第714页。

⑪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292—297页、第398—399页。

(责任编辑 阎志强 刘一兵)

(上接第82页)

⑥《洋务运动》卷七,第121页。

⑦《洋务运动》卷七,第128页。

⑧《直境开办矿务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第141页。

⑨⑩同上书,第140页。

⑪《盛世危言》开矿上,《附开平矿事略》。

⑫⑬《洋务运动》卷七,第123页。

⑭⑮同上书,第119页。

⑯同上书,第123页。

⑰同上书,第122—123页。

⑱《洋务运动》卷七,第133页。

⑲⑳《洋务运动》卷七,第131页。

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40页。

㉒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张翼委派德琳札》。

㉓《洋务运动》卷七,第120—121页。

㉔李鸿章《请减出口煤税片》,《洋务运动》卷七,第141页。

㉕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9页。

㉖金达《华北铁路和煤矿》,第283页;出货量数字见《海关统计》,1882—1900年。

㉗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1页。

㉘同上。

㉙《洋务运动》卷七,第140—141页。

㉚《洋务运动》卷七,第133—134页。

㉛《洋务运动》卷六,第154—165页。

㉜《洋务运动》卷七,第123页。

㉝《捷报》,1885年6月5日。

㉞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8页,表17,《直隶开平煤矿年表》。

㉟《清光绪朝外交史料》卷182,第10页。

㊱《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第538页。

㊲《河北矿务汇刊》调查,第14页。

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84页。

㊴同上,第84—85页。

㊵《关册》,1895年统计报告。

㊶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一,第2页。

(责任编辑 阎志强 刘一兵)